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主 编 李定开

副主编 吴洪成

重庆教育史

第二卷

本卷主编 李定开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重庆教育史

第二卷

主 编 李定开

副主编 吴洪成

本卷主编 李定开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编委会

(均以姓氏笔画为序)

名誉顾问	何东昌	邹时炎	杨海波	陶西平
顾问	王炳照	田正平	江 铭	郭福昌
	潘懋元			
主 编	周玉良			
副主编	汤世雄	宋恩荣		
雄 委	王日新	王豫生	方 骏	冯象钦
	齐红深	刘文璞	安效珍	李才栋
	李定开	杨进发	张凤民	张 彬
	陈乃林	陈光华	金汉杰	赵宝琪
	姜树卿	高 志	阎国华	符康荣
	傅九大	蒙荫昭	蔡寿福	熊贤君

《重庆教育史》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欧可平

副 主 任 蒋国昌

委 员 欧可平

宋乃庆

周富道

张学敏

彭智勇

蒋国昌

胡 斌

李定开

李跃文

陈流汀

彭智勇

孟小军

吴洪成

宋乃庆

陈流汀

孙文松

唐智松

名 誉 主 编 蒋国昌 彭智勇

编辑室主任 孙文松

主 编 李定开

副 主 编 吴洪成

本 卷 主 编 李定开

《重庆教育史》序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重庆教育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张万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来,重庆教育在党的领导下,在不断探索发展中取得的辉煌成就有更多翔实生动的记载。在史料方面多有新的发掘。

《重庆教育史》总结了历史上的教育经验,有益于当今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借鉴。在宋代有张载到合川、程颐到涪陵办书院的经验,在清末有张森楷在合川办实业教育的经验,在民国前期有吴芳吉办江津中学的经验,有张伯苓办重庆南开中学的经验,有陶行知办育才学校的经验,有周勛成办巴蜀学校的经验,有杨若愚办树人学校的经验,有傅仁敢办清华中学的经验,有晏阳初办华西教育实验区的经验,有卢作孚办民众教育的经验等等。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区县各级各类学校都积累了很多办学经验。

毛泽东同志曾十分精辟地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重庆教育史》对重庆3 000年的教育历史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生动的描绘。

希望全市各级教委(局),应认真组织广大教育行政干部、广大教师、大专院校的学生学习《重庆教育史》,这必将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2005年9月

《重庆教育史》导言

《重庆教育史》记述了重庆 1997 年直辖后,直辖市范围内 40 余区县从远古到公元 2000 年,在各朝各代、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事实、教育思想,并揭示它的发生发展过程的历史。构建了从古到今的完整教育发展体系,全面、具体地展现了重庆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状况及其利弊得失,并揭示了教育的历史本质,分析了历史规律,总结了历史经验,作出了价值的判断。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地方特色突出,基本做到了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具体言之,有如下特点:

第一,全书的体例采用了断代与专题相结合的形式,较为系统地梳理和恰当地划分了重庆教育发展阶段和情况。全书基本上以朝代为依据分段,但又按照资料的多寡有一个朝代为一段者,也有几个朝代为一段者。如第一卷第二章,包含了两汉魏晋隋唐几个朝代,第三章至第四章基本上是以一个朝代为一段,第五章至第八章把清代分为前中期和清末两个时段,用四章的篇幅记述之。每一章中又按官学、私学、书院、科举、教育人物等专题而具体记述。第二卷亦然。第三卷前四章分段记述,后四章在一个段中分专题论述。在分卷上未按古代、近代、现代来划分,而是按资料的多少,把从原始社会到清代末年的重庆教育定为第一卷,把民国时期的重庆教育定为第二卷,把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重庆教育定为第三卷。如此,使三卷能基本平衡,在分量上相差不太远。从重庆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第一卷展示了古代巴族文化与重庆教育的发生和发展,第一卷末和第二卷展示出重庆新教育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第

三卷展示出新中国成立后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学校教育的接收、改造、建设、发展的曲折过程。

第二,全书的内容突出了重点。第一卷,清代的重庆教育比较发达,用了四章的篇幅来进行详述,从文字的分量上看,此四章占全卷的一半以上。第二卷突出了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全卷共十一章,抗战阶段的重庆教育占了六章;从文字的分量上看,此六章占全卷的一半多。第三卷突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庆教育,且按专题将此时段分为四章进行撰著,从篇幅的分量上看,占全卷的一半还强。

第三,体现了地方特色,做到了从本地区实际出发来安排章节,并突出了本地区对全国教育的贡献。如重庆的原始先民为“巫山人”,后改称巴族,第一卷便从巴文化入手,揭示了重庆文化教育的发生与发展。后来,重庆的居民以汉族为主,还包括土家族和苗族,全书便以大量的篇幅写汉族教育,同时也安排了相应的章节来撰著土家族和苗族的教育。抗战时期衣冠西渡,全国不少教育家来到重庆,大搞教育实验,努力进行教育教学,为重庆教育贡献了力量。第二卷的教育人物中便用专节介绍了黄炎培、张伯苓、傅任敢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在第八章第二节撰述河南籍教育家邵爽秋的民生教育实验;在第十章第三节,专写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华西实验区的教育实验;在第五章第一节中用一个问题来记述“战区中小学教师安排——第三服务团”。另外,抗战期间,战区流亡学生纷至沓来,为了反映国民政府对战区流亡学生的安排,在第五章第一节里还专题撰写了“收容战区学生”。更重要的是,抗战期间战区各级学校迁渝,使重庆的各级学校教育发展到极盛,真可谓“学校如林,庠序盈门”,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教育的中心。战区学校的迁渝,使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新思想、丰厚的人文精神充盈到这块土地上,同时,这块沃土“又为战后教育与文化的复兴保存了民族的命脉”。特别是迁渝的好些高等学校,来时规模较小,

复原时规模扩大了若干倍,浩浩荡荡地迁回战前原址,第二卷用了不少笔墨来撰写之。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重庆武斗特别严重,破坏性很大,给教育带来了严重恶果,第三卷第三章试图反映这一基本情况。1987年至1997年,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在合川开展“生活教育”整体改革实验,历时10年之久。为反映这一实验情况及其效果,第三卷第八章第六节专题撰写了“合川陶行知创造教育实验”。总之,这部书基本上反映出重庆教育历史的地方特色。

第四,该书对重庆历史上的教育资料有不少发掘,这是对重庆教育乃至对中国教育做出的贡献。从第一卷的前半部分不难看出,作者翻阅了大量的上古时期的有关历史资料,参考了三峡考古的新发现,基本弄清了重庆人的来龙去脉和巴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为重庆古代教育理出了一个基本线索,同时,有新的发现。第一卷后半段的清代重庆教育资料特别多,是因作者查阅了清代重庆40余区县的县志,才使清代重庆的教育内容较详细地得以展现。第二卷和第三卷扩充了原四川省的万县地区、涪陵地区和黔江地区的相关内容。把各区县县志和教育志中发掘的新资料都纳入了这两卷的内容。在这两卷中,重庆市各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革命活动、教育改革都得到了展示,教育、教学经验得到了总结,这显然是查阅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校史,从中发掘了不少资料。在教育人物方面,第一、二、三卷都有新的发现,如荣庆是重庆出生的教育人物,白屋诗人、教育家吴芳吉,真正的师表——唐以荣等,并使这些新发掘的教育人物的教育思想得到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整理。

第五,该书注意了史论结合,不但叙述历史,而且也有评论,在评论中有抑有扬。第一卷对每一时期的教育状况和教育人物都进行了概括提高,某些章节还进行了专题评论。第二卷对每一章的教育事实,都专门安排了对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探索一节,一方面概括提高,另一方面进行简要的评说。第三卷各章都安排一节

评析当时教育发展中的成绩和问题,并对成绩加以颂扬,对问题提出对策,基本上做到了抑扬结合。

第六,该书在撰写过程中注意了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国史和地方史的关系,该书总是以中国教育史为纲,统帅重庆教育史;从中央和地方的角度看,重庆市一般都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和统一规定。但也有不完全按中央政府统一规定办理的,如北碚三峡实验区的卢作孚。他在区内中小学实行的有独到之处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举措,有其特别之处。二是重庆市和四川省的关系,现在重庆所管辖的范围,原是四川省在川东的三区(或四区)一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抗战时期重庆市区除外)和重庆直辖之前都属四川省政府管辖,因此,在教育方面除贯彻中央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外,还要贯彻四川省政府的批示和决定,表明是四川省的一个部分。

第七,该书在研究方法上注意了用对比的手法,即把重庆地区 and 全国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相对比;把重庆市和成都市相对比;把重庆市各区县和四川省各区县相对比;把重庆市范围内各区县相对比。并在对比中加以量化和分析,得出重庆市在全国、在西南、在四川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教育地位,以及其在各个时期的地位变化。

从以上特点可知,《重庆教育史》是一部教育的历史书籍。中国近代教育家杨贤江说:“教育史便是以叙述教育事实及思想(即所谓实际及理论)之变迁发达为目的者。故凡称为详尽的教育史书,必要对于教育事实之变迁发达分为教育的事实、教育者的活动与教育制度、法规等,详为记载,再要对于教育的思想学说即所谓理论者,广为记录,或更加以评论。”《重庆教育史》正是这样地记载了重庆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事实(实际)、教育思想(理论)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对各阶段的教育事实和思想进行评论分析,以达到总结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经验,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目

的。要求笔者在撰写过程中做到有论有史,史论结合。正因为如此,它和教育志书不同。志者记也,文字记录之意。志书,为记录的书籍。所以,《重庆教育志》虽然中正地记录了重庆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事实、教育人物的活动,但不加评论分析,在写作过程中采用记述文体。这就是《重庆教育史》和《重庆教育志》的区别,也就是为什么有了《重庆教育志》还要写《重庆教育史》的原因。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育才学院 李定开
2005年8月

自序

《重庆教育史》(第二卷)是《重庆教育史》的重要部分,这是由于重庆市的地位及其在民国时期的教育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就重庆市所处的地位而言,在古代虽为巴子国,但与中原地区相比较是非常落后的,被视为蛮夷之地,谈不上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多大发展。从宋朝到清末为重庆府,其政治、经济、文化虽然逐步发展起来,成为川东重镇,是川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它毕竟是普通的省辖府,与省会成都府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到了民国初年,重庆几度为四川省会,其地位有所提高。1929年又定为普通市,跻身于全国大都市的行列。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渝,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期间的首都,成为东方反法西斯战线的指挥中心,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自然也就成为全国教育的指挥中心。就其教育的发展状况而言,在东汉以前,也就是在巴子国时期,教育十分落后,史家评论曰:“无才少学。”东汉以后,刘璋置巴郡,开始建立郡国学校,宋以后学校教育有所发展,明清时期形成封建教育体系,在川东地区处于教育领先地位,但毕竟是一个小范围内而言。鸦片战争后,西方教育传入中国,也慢慢地传到重庆。在清朝末年,重庆已有新式学校,但仅处于萌芽状态。民国建立以后新式学校教育开始发展,到抗战前夕,学校系统已基本形成,管理体制已基本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已建立健全起来。抗战爆发,随着国府面迁,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西移,大批的衣冠西渡,大中小学亦纷纷迁来重庆及其周围的川东地带,使重庆市和四

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区、第八行政督察区、第九行政督察区,即现在重庆直辖后的辖区范围内的教育得到飞速发展,成为抗战期间全中国教育最发达的区域。当时的教育发展程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是重庆教育史上最光辉的时期。《重庆教育史》(第二卷)就是着重描绘这个时期重庆教育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并揭示其规律的,所以它是《重庆教育史》的重要部分。

《重庆教育史》(第二卷)分三个阶段:民国前期阶段、抗日战争阶段、解放战争阶段。这三个阶段包含着重庆教育由不发达达到发达,再由发达达到衰落的过程。在民国前期(1912~1936年),重庆教育在清朝末年的基础上有了初步发展,逐步形成各级学校系统。在幼稚教育方面,清末有曾先杰创办的第一所幼稚园。在此基础上经过民国前期24年间的新建,重庆市和川东三区共有幼稚园(班)25所,其中附设的13所,独立设置的12所,做到了一半以上的区县有幼稚园。在小学教育方面,三个行政区(重庆市尚未建立)在清朝末年有小学堂236所。在此基础上,经过民国前期24年的恢复、改革和创办,三区一市(1929年建立重庆市)共有小学校1954所,比清末民初增加1929所。在中学教育方面,民国建立前,三区有中学堂21所。经过民国前期24年的恢复、改革和新建,到1936年为止,三区一市共有中学校83所,增加62所。在师范学校方面,清末民初的川东三区仅有两所师范学堂,在此基础上,经过民国前期24年的破旧立新,到抗战前夕为止,三区一市共有师范学校17所,增加了15所,为清末师范学校数的8.5倍。在实业、职业学校方面,民国前期24年,川东三区一市共创办实业、职业学校45所,以三区27县加重庆市5个区,共32区县计算,每个区县平均1.43所。在高等学校方面,前清遗留下来的仅有几所法政学堂,如重庆公立法政学堂、川东公立法政学堂、重庆官立法

政学堂、川东官立法政学堂、川南法政学堂等。在民国前期的24年中,这些法政学堂均逐渐消失,随之而建立起来的是省立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西南体育专科学校、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四川省立陶业专科学校、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等。其系科设置包括了文、理、工、农、教育、艺体等专业,逐渐向综合性方面发展。在各级各类学校发展和新建的同时,其教育、教学制度,学校管理规章、教育领导体制也趋于完善,为战时重庆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阶段(1937~1945年),重庆成为中国战时的首都,沦陷区的大中小学学生纷纷来川来渝,迫使国民政府必须进行安置;本地儿童年出生率的上升和中小学毕业生的增加,也要求入学和升学,这就给国民政府增加了办学的压力,由此而不得不新建大批的学校;另有沦陷区大中小学的迁渝迁川使得战时重庆和川东三区的学校数迅速增多,出现了教育迅猛发展的局面。在幼稚教育方面,重庆市和川东三区在八年间新办幼稚园80所,加上战前的25所,共105所,增加了3倍。在小学教育方面,第三区无全区性的统计数字,仅重庆市区、第八区、第九区在八年抗战中共发展到3073所,比战前三区一市增加了2119所,小学校增加的数量是各级学校中最多的。在中等教育方面,战前三区一市有中等学校119所,经过八年抗战的发展,已达到332所,共增加了213所,中等学校的增加数也算不少。在高等教育方面,重庆及川东三区在战前仅有高等学校3所,战时新建12所,内迁42所,重庆市在战时共有高等学校57所,比战前增加了51所,增加了17倍。高等教育的增加数也是很大的。由此可见,抗战8年,重庆及川东三区的各级各类学校都在成倍地或成10倍地增加,使重庆发展成为全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

解放战争阶段(1946~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的东迁,内迁学校的复原,衣冠东渡,内战的发生,重庆教育又走向衰落。不过在复原过程中,数十所中小学虽迁离重庆及川东三区,但影响不大,因为重庆及川东三区在抗战期间已新建相当数量中小学校。以普通中学为例,到1949年为止,重庆市区有普通中学50所,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区(包括荣昌县、潼南县、长寿县、北碚三峡实验区)有普通中学95所,四川省第八行政督察区有普通中学35所,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察区有普通中学24所,三区一市共有普通中学204所,比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182所反而增加了22所。师范学校也是如此,到1949年止,重庆市和川东三区的师范学校虽然数量增加甚微,但其质量变化较大,不少前期师范发展为中级师范,如合川、綦江、永川、长寿等县的师范学校均属此类。高等学校却与此相反,由于战时重庆的专科以上学校大部分是省外迁来的,外迁学校复原后,就仅剩三、五所了,如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国立工业职业专科学校等,使重庆的高等教育元气大伤。一些复原离校的留渝师生,打算利用复原学校的校址另办新校,但国民政府不予立案,就只好偃旗息鼓。重庆市的中等学校,到了1947年以后,由于蒋介石集团热衷于内战,把大量的资金用在军费开支上,办学经费十分困难,重庆市和川东三区的教育便呈下降趋势。如第九行政督察区的普通中学由1948年的38所下降到24所。可见当时国统区的教育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已全面衰败了。

根据以上三个阶段的教育情况,《重庆教育史》(第二卷)分为三编。第一编三章:第一章,民国前期的重庆教育(普通教育);第二章,民国前期的重庆教育(专业教育);第三章,民国前期的重庆教育(民族教育、社会教育、教育思想)。第二编分六章:第四章,抗

日战争阶段的重庆教育(初等教育);第五章,抗日战争阶段的重庆教育(中等教育);第六章,抗日战争阶段的重庆教育(高等教育);第七章,抗日战争阶段的重庆教育(社会教育);第八章,抗日战争阶段的重庆教育(教育理论与实验);第九章,抗日战争阶段的重庆教育(在重庆的教育家)。第三个编两章:第十章,解放战争阶段的重庆教育(教育复员与重新布局);第十一章,解放战争阶段的重庆教育(本土教育家)。

本卷作者列后,第一、第二章、第三章由黄小兰、李定开撰写。其中第二章第三节由张绍群撰写,第二章第五节由徐永柱撰写。第四章、第五章、第九章第四节由李小鹰撰写,第十章由胡福贞撰写,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一节、第九章、第十一章第一节由李定开撰写,第八章第二节由张传燧撰写,第十一章第三、四节由黎明撰写。本卷开始由李定开设计,最后由李定开统稿。

我们在编撰《重庆教育史》(第二卷)的过程中,参考了下列主要书籍和史志:王彬编《四川现代史》、宋恩荣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四川教委编《四川省志·教育志》、重庆市教委编《重庆市教育志》、重庆市各区县志、重庆市各区县教育志、重庆市各大专院校志、重庆市部分中学校志等。这些书籍和史志为我们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大量的原始资料及论证材料,我们多有引用、借用、节录、改用等。在此特致衷心感谢!

西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育才学院 李定开

2002年1月15日

目 录

《重庆教育史》序	(1)
《重庆教育史》导言	(1)
自 序	(1)

第一编 民国前期的重庆教育

第一章 民国前期的重庆教育(一)——普通教育	(3)
第一节 蒙养园与幼稚园的创办和发展	(3)
第二节 小学教育	(10)
第三节 私塾的改良	(29)
第四节 普通中学教育	(38)
第五节 中小学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探索	(61)
第二章 民国前期的重庆教育(二)——专业教育	(72)
第一节 师范教育	(72)
第二节 实业、职业教育	(83)
第三节 高等教育	(95)
第四节 留学教育	(106)
第五节 专业学校的教育、教学及行政管理探索	(113)